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 诺桑觉寺

[英] 简·奥斯汀/著 麻乔志/译



PENGUIN CLASSICS

企鹅经典

# 诺桑觉寺

[英] 简·奥斯汀 / 著 麻乔志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诺桑觉寺/[英]简·奥斯汀(Jane Austen)著;

麻乔志译. -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8.3

(企鹅经典)

书名原文:Northanger Abbey

ISBN 978-7-5366-9043-1

I.诺… II.①简…②麻… III.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32370号

## 诺桑觉寺

NUO SANG JUE SI

[英]简·奥斯汀 著

麻乔志 译

---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廖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 李江华

封面设计: 余 静

---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中青印刷厂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8.25 字数: 192千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5.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809955转8005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英文版导读

《诺桑觉寺》是奥斯汀最早完成的一部小说，虽然当时《理智与情感》和《傲慢与偏见》已经开始动笔。卡桑德拉·奥斯汀的备忘录中曾这样记载，“《苏珊》（《诺桑觉寺》的原名）写于 1798 至 1799 年间。”当时，奥斯汀二十三岁，住在儿时成长的地方，汉普郡斯蒂文顿教区的小村庄雷克托里。

这部小说的大部分故事，发生在度假胜地巴斯，1797 年 11 月奥斯汀曾去过那里，与一对富裕的叔叔阿姨住在李一派洛茨。1799 年 5 月，她与自己最富有的哥哥爱德华爵士住在那里的皇后广场。1801 年，在父亲将斯蒂文顿教区交接给助理牧师——长子詹姆斯后，她与父母迁往巴斯，居于西德尼路四号。奥斯汀在巴斯居住的经历，大大丰富了这部三十章小说的前二十章，这些故事写到了附近的公共场所，街道小巷，那些步行或坐车很容易到达的地方。

1816 年，奥斯汀为《诺桑觉寺》写过广告，广告中说到，“这本小说 1803 年完成，当时准备立即出版”，言下之意是对于这部书稿，至少他们在最后时刻，应该做些什么才是。1803 年春天，伦敦的一个叫本杰明·克罗斯贝的书商付给奥斯汀的哥哥亨利十磅，买下小说书稿；他们为此书作了广告，但并未出版，也未解释是什么原因。六年后，奥斯汀以艾斯顿·丹尼斯夫人为

笔名，给克罗斯贝写了一封强硬的信，要求解释原因，并称若小说原稿已经丢失，愿意再提供一个副本，同时威胁道，若克罗斯贝不合作的话，她将另寻东家。克罗斯贝的儿子回信道，倘若她真的将小说更换其主，他们将采取法律行动控告对方的出版社。他们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将小说书稿“原价奉还”。

1805年，奥斯汀的父亲去世，其后的两年多，她的状况一直很动荡。1809年，她与母亲和姐姐最终在汉普郡的村庄乔顿定居下来，那个不大而美丽的地方是哥哥爱德华爵士的庄园。虽然她对出版商产生了失望，但她依然想认真地完成这部小说：希望能再拾起《苏珊》，将其润色修改，最终出版。但此时，她并未原价买回书稿，而是着力创作《理智与情感》（1811），之后又完成了《傲慢与偏见》（1813）。1815年12月，《爱玛》出版后，通过亨利，她买回了《苏珊》，1816年，她开始为此书的出版做准备。她更换了女主人公的名字，小说的名字也变为《凯瑟琳》，之后，为此书的出版写了一个简短广告。

1816年秋，奥斯汀因患肾病，身体状况恶化，于1817年7月18日离开人世。1817年3月13日，她给侄女范妮写信提到，“凯瑟琳小姐被搁到书架上了，不知何年何月方能下架。”小说被重命名为《诺桑觉寺》后，附上了她哥哥亨利写的一篇很重要的前言，于1817年12月末出版（首页标明的出版日期是1818年），作为四册本的前两部分，与《劝导》一起面世。这两部小说都未经过作者最终校阅；当然她也无法看到这一切了。从1809年的信中可看出，《苏珊》的手稿，长期保存在奥斯汀的手中，她给克罗斯贝先生的是第二个副本。1803年写完之后，其实她随时可以修改这部小说，但当时版权在克罗斯贝手中，所以她并不想这样做。买回手稿在法律上是必要的，但也是一笔不必要

的花费，尤其是在她父亲去世后那几年，她的经济状况实在堪忧。同时，直到她的其他小说取得成功后，她也才有信心找到出版商，出版她的处女作。这就是 1816 年初之前的那段日子，她没有再次修改这部小说的理由吧。也许，她当时也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这个。

在研究奥斯汀的已成立的学说中，其中，索瑟姆曾讲过，他认为，很有可能是在 1816 年 7 月她完成《劝导》之后，对《苏珊》做了大量的修改。他指出书中对蒂尼上将作为一个消费主义者的全面而讽刺的描写，表现的是对 1816 年以来的战后时期的社会的一种担忧，这种社会担忧在当时很普遍。在简·奥斯汀的其他作品中，最接近索瑟姆观点的是《桑底顿》。《桑底顿》写于 1817 年 1 月到 3 月间，这部作品她只写了一些片断。但我们也知道，那年秋天，奥斯汀已经身患重病了。但也不排除另一种情况，因为在 1800 年之前以及 1809 年的时候，消费主义即是文学中流行的主题，也是当时普遍被谈论的一个社会话题。当然，这也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小说的一些部分一直能敏感地把握流行的神经，这令奥斯汀对小说中很多不同的地方重新发生兴趣，结果不可避免地发现，有一些部分所描述的一切已经过时了。

尽管并未指出她现在交出的这部小说是与 1803 年的《苏珊》完全相同，奥斯汀在 1816 年的广告中曾承认，她并未像她自己和读者所期望的那样，对小说进行更新，使它更能确切反映当时社会的现状。（在《劝导》里，她勾勒出一幅完全不同的，非常时髦的巴斯社会风俗图，在那里，达官显贵们，私下来来往往，举办各种娱乐活动）。倘若她无法做一些实际的，商业性的改动，那么，有什么理由认定她对此做了微妙的文学修改呢？

大多数奥斯汀的评论家和编辑们，对于索瑟姆的观点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 1803 年写完后，这部小说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新的改动。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小说中，几乎并未参考当时发生的公共事件，很显然这个观点需要修正。另外一个说法也许更为站得住脚；小说参照的是 1803 年之前的那段时期，一些真实的事件，人物，以及当时的风土人情。

## 一 浪漫的世界

因为有评论家怀疑，这本书前后联系并不紧密，他们曾肤浅地写过一些复杂理论，关于此书的修改，段落插入，以及模仿并合并了两种小说体（巴斯小说和哥特小说）。尽管 19 世纪，奥斯汀的大部分仰慕者很是喜欢《诺桑觉寺》，但后来的人也抱怨，这部小说突然从对巴斯的社会风俗的描写，转入到对诺桑觉寺的哥特式嘲讽中，有些唐突。他们申辩，在这部尽力向自然主义靠拢的小说中，这种哥特式的讽刺除了文中出现的那一处外，在别的地方并未出现。大多数人认为，《诺桑觉寺》是少女时代的奥斯汀在早熟的青春期中写成的，所以，不比她年长时所创作的那些更为连续的自然成熟的杰作，如《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和《劝导》。

正如《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范尼·普雷斯，《诺桑觉寺》中的凯瑟琳·莫兰最先被描写成一个孩子。范尼初次踏入成人世界后，脑海里的一系列变化，体现了奥斯汀日益成熟的写作技巧。而《诺桑觉寺》中，凯瑟琳的成长，则贯穿小说的整个篇幅，这点从她那跳跃的，天真而不够深刻的内心活动中可以看出来。

同样，比起爱玛，以及《劝导》中的安妮·爱洛特，《诺桑觉寺》本身并不成熟，就如它的主人公一样。但是，奥斯汀六部小说的批评，过多地把重点放在了女主人公身上，就好像这些女主人公能代表读者的看法一样，似乎只有她们才能引导读者走入小说里的世界。

任何一个诋毁《傲慢与偏见》中的莫扎特式的优雅与热忱的倾向看上去都很可疑。《诺桑觉寺》，活泼轻快，充满青春气息，笔调温暖，大量依赖对话进行叙述，在这点上，比其他作品更为接近《傲慢与偏见》，但《诺桑觉寺》更为奇特，更具实验性，在故事的载体即小说这种形式上，更具创新性、挑战性。可以说，这是一部充满野心的，具有革新意义的作品，以知识分子式的揶揄来玩转小说。

奥斯汀能成长为一名作家，与她大量的阅读是分不开的，他们家共有七个孩子，对表演与朗读的热爱，为这个家庭带来很多欢乐。对奥斯汀家而言，阅读小说并不是一件私密的事，而是一项集体活动：大家都参与进来，一起讨论，表达各自的见解。《诺桑觉寺》中，主人公的童年是在教区度过的，里面同时也提到了各种各样的阅读，种类繁多，包括小说，严肃的非虚构作品，指南类用书，甚至是报纸（巴斯有三份报纸，均为周刊）。正如她小说里的人物，读过很多不同的史前史，她的读者也是这样的。奥斯汀是期望我们怀着相当丰富的常识，来阅读这部大量引经据典的作品的。

这里也颇具实验意味。奥斯汀与她的读者玩了一个游戏：这个游戏要求读者也必须也是个小说爱好者，否则，在故事里面，将会找不着北。《诺桑觉寺》中，起初，在阅读上，这位女主人公是个天真浪漫的初级读者，阅读对她而言，是很个人化的

事，后来，经过与人接触交往，她逐渐地对阅读产生了更大兴趣。这番阅读的教化过程在凯瑟琳身上很明显地体现出来。奥斯汀挑战着我们的知识面，比如以下这些，都是当时的小说里常常运用的套路，如：女主人公们有着出众的美丽；她们可能会遭遇到各种困难；一系列充当监护角色的人们，父母，女监护人，没有看住她们；以及可婚嫁的男人的出现。当阅读《诺桑觉寺》的时候，我们必须得记住，须事先读过很多书和故事方才理解得通。

《诺桑觉寺》是奥斯汀所有小说中自我意识最为独特的一部，它用一种流行的方式，刻画了外部的世界。它的自觉性，真实地反映了古老复杂的那个年代的风貌。那个时期，“意识形态”与“理论家”这样的新词被造出来，“演说”与“文化”这样的词都具有了现代意义。无休止的再造，表达了人们对“世纪末”迷恋的心态。

所谓的浪漫主义革命，实际采取了各种文学类型。首先在书名上，采用的是古老的类型小说中的名字，用来挑战或驱除旧有的题目。浪漫故事，歌谣，十四行诗，所有这些古代的过时的形式，在18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里，又重新出现，18世纪行将结束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一种新的类型，即哥特式小说，意在恢复了古老的故事和信仰；采用的是非常复杂的格式，建立在对话的基础上，或者说，是建立在苏格拉底哲学式的对话上，尽管人们认为这类小说有知识分子气息，但很明显，它并未完全流行开来，以上这些传统在《诺桑觉寺》中都有使用，这部作品正体现了上述类型小说的特点。

文中的凯瑟琳，对大多数书都很排斥，对于关于时事的辩论也无法插嘴。与蒂尼兄妹去山毛榉崖散步的时候，她幼稚地

抱怨历史的冗长。

不同的人读到山毛榉崖的对话，会产生不同的体会。奥斯汀通过这场对话，挑战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倘若一个读者，像凯瑟琳那样，只有初级阅读水平，那么，她就无法读出这些对话背后所隐藏的含义的，她体会不出喜剧性的讽刺，在山毛榉崖的对话中，亨利已经战胜了凯瑟琳——因为他所谈论的，都是正在成长中的历史。相反，第一轮的胜利者应是爱丽诺，凯瑟琳的这位博学的同盟者，她通过近代历史学家笔下虚构的历史故事细节（这些故事中历史人物的演说、想法，都是作家想象出来的），来捍卫小说的用途。比起第五章里奥斯汀的小说的捍卫的言论，这段辩论更具技巧性，知识性，巧妙地反驳了亨利，此时，亨利已经对虚构的历史故事做出让步，承认了他很喜欢安·雷德克利甫的历史小说。

尽管“女人”的故事起初占了上风，但当敏感博学的爱丽诺相信凯瑟琳所说的伦敦将要发生可怕的事件的时候，亨利从男人的角度成功地进行了反击。实际上，凯瑟琳指的就是米诺娃出版社最新的出版物。这两个女人的糊涂，给了亨利一个机会，借此他可以作为一个辩论者来嘲笑爱丽诺，这也使得凯瑟琳关于小说的看法，免于遭到亨利的反驳。不同类型，各有各的构成规则；一个读者有必要知道，她究竟属于哪一类。倘若我们搞错的话，就会像凯瑟琳一样，将虚构与非虚构完全混淆，如在她来到诺桑觉寺后，将蒂尼上将想象成了小说中的坏人；不过这种想象其实也符合人性，倒是可以谅解的。

山毛榉崖的对话，成为三位主角——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三重唱。在书中，除却早先凯瑟琳和亨利单独的对话外，在整个下部，这种三重唱不时出现。三人间的交谈之下，流淌着

一种默契之感，而这种默契感，只有去渥德斯顿的愉快的短途旅行中，方能媲美。在山毛榉崖，他们似乎只是很自然地闲聊着，然而就是在闲聊中，却彼此交换了很重要的观点想法，从而反映了各自的价值观和生活哲学。这里可真要谢谢蒂尼（而不是她的第一位人生导师伊莎贝拉），从蒂尼兄妹那里，凯瑟琳发现，书本为她打开了很多的世界。通过放松的方式，他们对这个世界进行了一番探讨，亨利发挥了他恋爱中的主题，之后又结束了它。相互的理解源于各自有多少的不同。文学类型是为成年人而分的，而游戏是为孩子而设的（也包括成年人），特别的体系结构暂时令复杂的现实归于有序，也使得下定论有了可能性。在这点上，尽管凯瑟琳对亨利的话一知半解，但是亨利还是给凯瑟琳上了一课，人们的思想，运转着这个世界，而思想的不同，则源于人们阅读类型的不同。

## 二 另一位女性小说家

《诺桑觉寺》中，小说是人们小小的追求，是人与人之间连接的社交纽带，是对喜悦与满足的一种寻求，指引着人们了解外部的世界。阅读这一主题，散布于小说的整个篇幅，尽管有人不断置疑，这部小说结构不严谨，但它并未完全发散，只是因为，奥斯汀在创作中，参考了种类非常不同的小说。严格来讲，对于巴斯城的描写，在情节和主题上，广泛地参考了理查逊式的以女主人公为中心的这类小说，正如对诺桑觉寺那充满文学色彩的精准的描写一样，这一部分实际借鉴了当时的许多著名小说。从小说的前两章开始，在对巴斯城的参观中，以下

这点逐渐清晰起来，奥斯汀希望她的读者记住的是理查逊小说的重要继承者柏尼：从某方面讲，她的小说《埃弗林娜》（1778），部分是以巴斯城为背景的，或者《赛西里亚》（1782），这里的男主人公来自一个势利的贵族家庭，这一点，在《加米拉》（1796）中更为明显，这部小说在发表之前，奥斯汀对其就心存向往。

凯瑟琳的家庭环境，也与加米拉的情况很相似，她是一家的长女，有一个慈爱而忙碌的牧师父亲，母亲很能干，从不感情用事。加米拉被托付给她那位受人尊敬的，然而却愚笨粗心的叔叔泰罗德·雨果爵士，无意中给她增添了许多麻烦，就如凯瑟琳给托付给那位愚蠢的爱伦夫人一样，她竟让凯瑟琳轻而易举地掉入索普兄妹的纠缠中。加米拉有可能成为雨果的继承人，小说自始至终，这种可能性一再浮现出来，结果给她造成了很多麻烦；就如传言所述的凯瑟琳对爱伦夫妇有所图一样，这一点也推动了《诺桑觉寺》的情节发展。

这些文学前辈作品的影子，不时在文中出现。

奥斯汀也不可能苛刻地要求我们阅读她提到的每一本书，无论是她最喜欢的《加米拉》还是她的女主角所痴迷的《优多福》。人们对小说的谈论，在文中起着各种不同的作用。谈书论书，是与社交和友谊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友谊，通常是建立在共同的兴趣和追求之上的：如，山毛榉崖的谈话，通过各自的读书兴趣，表现了两种不同风格的友谊；再比如，第六章中，安德鲁斯小姐给伊莎贝拉所列举的书单。同样，倘若读者对18世纪的小说世界如主题、情节安排有所了解的话，那么，读者将从《诺桑觉寺》中发现很多耳目一新的地方。

同样的情节，因心理作用而被放大的危险，在雷德克利甫

历史类的传奇故事中都出现过，如《西西里传奇》、《林中传奇》，以及《优多福》（1794）。在他们坐车前往诺桑觉寺的途中，亨利为了给凯瑟琳找点乐子，巧妙地将这三部哥特小说的情节融合在一起。换句话说，哥特式的写作套路，不可能从理查逊—柏尼那看上去更为自然的写作传统中彻底地分离出来。她通过将当代小说的衍生种类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作品中连续的情节，奥斯汀将一系列在时间上分散但是却相通的主题集中起来。

最终，《诺桑觉寺》因其自身的趣味，悬念和色彩而毋庸置疑地可以被称为一部浪漫小说。凯瑟琳的历险，就如攀登魔豆的杰克，做了水手的辛巴达，康斯坦斯的长途旅行，以及《蓝胡子的城堡》中的涉世不深的新娘。

尽管奥斯汀后来学会了更准确地描述笔下人物的财产状况，但她微妙地将描写重心从人转到物，这种转换更具重要性。《诺桑觉寺》，罗列了各式各样的人工制品，展现了原始人类学的技巧，它们的堆积，表现了一个倾向于享乐和索取的繁荣社会。巴斯的商店和舞厅，诺桑觉寺的房子和花园，都是消费主义者的奢华场所，斑驳、令人眼花缭乱，这些都是收入与品位的象征。

在这个小说里，代表着“这个世界”的那些次要角色，向别人展示着他们所拥有的物质，因为这些代表着他们的财富、地位和品位。即使是那愚蠢的爱伦夫人，也能用锋利的眼睛发现，她的老同学索普太太身上的外衣花边没有她的好看，因为这些表明了她们收入的差距。在这上面，奥斯汀并不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她并未太多陷入这种现代化的商业化的思想之中。

一些时候，这种游离，令她能以分析的态度去看待这一切，另一些时候，她则以评判的态度去判断这一切。在读者的眼里，

爱伦夫人真的很可恶，她竟然用花边和薄纱这么细小的东西，作为衡量他人的标准。当我们将物质与精神，道德和礼仪比较时，我们倾向于接受奥斯汀的道德主义，并被其说服。精神，道德，礼仪，它们拥有的是无法视见的价格砝码，如：好感觉，好品位，真挚的情感，流利的谈吐。尽管如此，各种商品的样式以及人们对它们的复杂态度，这些描写出现在奥斯汀和她的同代作家的作品中，非常有趣，这也似乎标志着那一时期描写风格的一个转变。奥斯汀笔下的巴斯城里的每个人，喜欢展示自己，或者从外在的那些标识上来判断他人。而奥斯汀自己，也通过笔下众多人物所购买的种种商品，对他们的价值进行了衡量。而她对各种日常商品的突出描写，无形中也为这部小说的商品化做了广告，它成为了商业出版商和书商手中的一件产品，一个由广告带动起来的流行出版物的坚定伙伴。

奥斯汀之所以将《苏珊》改名，原因是 1809 年出现了一部同名小说，这在学术上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她决定，倘若她将出版这部小书，那么，就一定要改名，但她可以在其他的地方使用这个苏珊这个名字，如《曼斯菲尔德庄园》中。

《诺桑觉寺》里，在对各种小说的借用中，凯瑟琳参观诺桑觉寺那部分，是最长最为复杂的一部分。这里面用了近乎一两章的篇幅，来描写凯瑟琳的那种恐慌，她带着读者，走入了雷德克利甫小说中那恐怖、神秘、幻觉的世界里。此刻，甚至巴斯的所有景象都受到了雷德克利甫哥特小说中那股迷信的超现实的气息的感染。亨利不可思议的离开和返回；爱伦夫人在巴斯城里，一次次渴望能找到朋友，讽刺的是，就好像在神话故事里一样，随着那对虚伪的朋友索普兄妹的出现，这个愿望竟得到了满足。之后，在去诺桑觉寺的路上，亨利很正式地详述

了在那儿可能会发生的一切，他提取了雷德克利甫小说中的片段，这些小说包括《西西里传奇》（1790），《林中传奇》（1791），以及《优多福》（1794），这一段，为阅读口味广泛的哥特小说读者们，提供了精彩而令人兴奋的一幕，读者走入了雷德克利甫小说中最有特点的场景之中——在夜晚，探究一个庞大而古老的建筑。

从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晚期，浪漫主义的哥特式作品总是被贬低，不仅表现在纸上作品上，而且还包括华而不实的建筑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面向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的读者群的小说。奥斯汀认为，就如司各特、柯勒律治、戈德温、拜伦、雪莱一样，雷德克利甫实际上开创了一种深刻而具有想象力的，知识分子式的颇具雄心的一种小说类型。她说的没错，雷德克利甫的小说中，人物行动和情节的设置，最初的源头是霍勒斯·沃波尔的《奥兰多城堡》（1764）。经过后继者的发展后，最典型的特点是，中心人物是一个粗鲁的暴君式的人物，这个人物利用巨大的监狱般的城堡，作为他的犯罪场所。但雷德克利甫并不是对沃波尔小说元素的单一而机械化的照搬，在很多重要方面，她做了很大的改变。她将读者的注意力从那位做作的坏人身上，转移到了那些女性牺牲品被夸大了的偏执的意识之中。把读者的注意力从事件本身，转移到了对事件的接受和诠释上，从而减少或者完善了沃波尔或者马修·格里高利·路易斯小说中有些明显的政治寓言。

亨利·蒂尼，这位娴熟的读者，从雷德克利甫的小说中抽取片断，将小说中的情节现实具体化：对对方的心理把握得极为精准。雷德克利甫笔下的女主人公是被孤立的，围绕在她周围的，不过是些陌生人，以及一些敌对的或者可疑的朋友。父母

抑或已双亡，读者对此无法确知，在故事中的某节，她会来到一座建筑中，白天，这里可能是一个庇护所，但是到了夜晚，却成为一个可怕的、鬼魂萦绕的地方。如雷德克利甫所描述：“神秘感萦绕在这些阁楼的周围，形成了故事中的背景。”总是在半夜，怀着被屋子里的其他人发现的恐惧，害怕撞到鬼，害怕即将可能发现的一切，她打开了上锁的门，摸索着走入了黑色的通道，之后发现了通往过去的通道——一张看上去熟悉的画像，带着血印的匕首，一卷纸或者一个装着骷髅的大箱子。雷德克利甫笔下的女主人公，探索着黑暗中的世界，一方面挑战着自己的胆量，而同时也暴露了自身性格中不成熟的一面。而人在孩童时代，才会对黑暗产生恐惧，而她对此却难以忘怀。战胜了恐惧后，她选择了理性，回归了正常的世界，文明、有序、合理的世界。

对雷德克利甫的最好的现代批评中，很多都在赞扬她的现代性。她教会她之后的包括奥斯汀在内的继承者们一种方法，就是如何通过故事，带读者走入主人公的意识世界中。最为复杂的是，雷德克利甫对空间意象的令人眩晕的描写，其中的建筑，充满了极端的恐怖：棺材般的走廊，局促的小房间，空旷的大厅，或者（《西西里传奇》中）破裂的楼梯井。

这里也有爱丽诺的妈妈，她去世了；在最后的日子里，胃病夺去了她的生命，而我们的主人公不禁想到，是她的丈夫毒死了她。但是，尽管雷德克利甫的女主人公，生活在对被强暴的恐惧中，人类邪恶的欲望，总是滋生在雷德克利甫式的充满暴力的，令人不安的古老时代里，但是在这里，凯瑟琳并未从性的角度，去想象上将那可能犯过的罪行。但是，无论是从政治的角度，作为专制主义来讲，还是从心理角度，即悲剧性的

受伤的潜意识的回归也好，奥斯汀从未让过去的阴影笼罩住现在。她对此的省略，抹平了雷德克利甫所营造的那种突出的空间图景，使其更加世俗化：这样，上将和蒂尔尼夫人，就生活在一个与现代人一样的光明而宽阔的世界里。

然而，奥斯汀还是令读者将雷德克利甫小说中象征性的情节与她自己的故事混在了一起，其中，有令人惊讶的相似。例如，爱丽诺，就是哥特式小说中典型的年轻女性的形象。温驯哀愁，孤僻压抑，忍受着一个在感情上无动于衷的父亲，这个父亲在日常生活中束缚着她，这种境况跟被禁闭也差不多。同时，她也从未从丧母的伤痛中解脱出来。而凯瑟琳这个人物，一旦剔除了雷德克利甫笔下的那种神经兮兮的臆想后，就可以很自如地去面对爱丽诺的不快，以恰当而又自然的方式，缓解她的悲伤，与她交谈。她与爱丽诺姐妹般的友谊，被细微地刻画出来，她们之间微妙的情感，与亨利对凯瑟琳的爱，占据了重要的叙述空间。在与爱丽诺和亨利的谈话中，她甚至通过小说中的次要情节，即伊莎贝拉对詹姆斯·莫兰和弗雷德里克·蒂尼的调情，揭露了后者的露骨的行为。而同样，对于伊莎贝拉爱欲的隐晦婉转的描写，在雷德克利甫那里，也能找到对应。比如在行将结束的章节里，年长女人的性欲因遭到禁忌而无法满足，在这几部分里，作者加重笔墨，描写了这种性欲幻想。

### 三 女主人公与三个角色

也许，关于奥斯汀的作品最不受质疑的概括是，读者可以通过女主人公的眼睛，看到每部小说中的世界。但是，如果凯